

梅兰／著

叙事、意识形态 与文学批评

XUSHI YISHI XINGTAI
YU WENXUE PIPING

文学批评的学理现代化和现实有效性并不因为文化和地域的差异而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还任重道远。

叙事、意识形态

与文学批评

梅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事、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 / 梅兰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068-5868-7

I . ①叙… II . ①梅…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
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 ①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4651 号

叙事、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

梅兰 著

策划编辑 李立云

责任编辑 李立云 魏焕威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树上微出版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71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868-7

定 价 28.00 元

导 言

文学批评在 20 世纪以来变得越来越棘手，西方文学及批评理论自晚清以来在中国的强势影响在 20 世纪末触发了反弹，比如从 20 世纪 90 年代持续到现在的所谓回归传统的呼声，关于中西文论及批评的各种争论也越来越激烈。但是，与其在中西理论问题上争来争去，不如回到批评实践中，弄清楚怎样运用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更深入、更有效地解读文学作品，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先霈先生指出：

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只是文化现代化大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应该成为一个孤立的口号，不要当作一个孤立的目标。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和现代化、科学化应该是同时并进，也就是说，建立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能够促进文学发展，能够使文学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理论，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①

而且，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是个动态建构过程，“是在思考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之中，自然逐步实行和实现的”^②。换句话说，从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角度来说，要打破一些概念和命题的思

① 王先霈：《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自序，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② 同上。

维定式，要在批评的过程中实现动态的文学理论本土化建设；不存在一个抽象和孤立的文学理论及批评的回归传统。

如果我们回到文学批评的开端，无论中西文论，批评都伴随着对文学作品的类别、内容、功能的阐释和探索；评判文学批评理论的标准，也往往是从文学批评的实效来看，好的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创作常常产生好的效果。因此可以将现实有效性看作衡量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

随着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与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也成为文学批评的题中之意，学术谱系的中西交融要求文学批评打破既定的界限，推进晚清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现代转型。学理上的现代化应当是评价文学批评的另一标准。

当前文学批评的视角与方法较为陈旧，批评标准主要还是依靠批评者的文学趣味，大多数文学批评习惯从思想意识、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等内容层面考量文学作品，很少深入作品的审美形式的研究中；文学史的视野被看作最具学理性的角度，这其实受到了中国传统史传文化的影响，批评者自身缺乏理论和方法创新的自觉。学理上的懒惰或迟缓的根本原因在于批评者中西文论知识谱系的欠缺。就批评的现实有效性而言，由于文化产业以及商业资本的影响，一些文学批评几乎沦为出版商的促销广告。对学术话语权的追求和自我炒作造成的文学批评的圈子化人情化，等等，都让人们对当下的文学批评产生怀疑，损害了当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

当下文学批评已陷入实践和理论的双重窘境，急需从现代学术视野出发，打通中西文论和批评，突出文学研究的方法意识，通过对 20 世纪以来的众多批评流派的批评视角和方法的吸收转

化，探索新的批评视角和方法。评论家王先霈先生对此提出了“圆形”批评，他强调动态全面吸收转化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批评流派的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批评方法。“圆形”批评其实是富有佛教智慧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圆通审美观念，结合了感悟与思辨，同时也是一种批评原则和阐释方法^①。

正是从这种思考角度出发，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系列批评论文，并分为三编，分别从史论视角、叙事与形式批评、意识形态批评三个角度来建设一种包容性、探索性的文学批评。从学理上，本书试图糅合 20 世纪的人文主义批评与科学主义批评思潮的视角与方法，尤其是叙事与意识形态两个维度，在针对不同的批评对象时，也着意展现叙事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不同向度的丰富性。从现实有效性来讲，本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比如张炜、韩少功、格非、毕飞宇、苏童、刘震云等，也有一些对中国当代影视、西方文学及网络文学的批评文章。无论是整体的作家论还是单个作品的批评，或是对叙事手法与形式特点的探究及对当代文学流派的点评，这些论文都希望突出批判精神和方法意识，将学理性与批判性融为一体，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磨砺不同理论与方法的有效性，同时也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选取和修改批评的角度与方法。

本书第一编侧重于史论视角，这些论文从整体性的文学史角度出发，或者立足于当代作家 30 多年的创作整体，梳理、研究当代作家的文本实验脉络，总结当代作家的创作特点；或者将西方文学中的欲望叙事作为线索，以个案研究方式，对西方文学史

^① 参见王先霈：《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4—47 页。

进行新的阐发；抑或以当代作家的新作为对象，评价总结某个当代作家总体性的创作特点和发展变化。但这些论文表明，即使在史论角度下也同样可以看到批评方法上的其他取向，或者说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始终无法束缚这些批评的叙事手法焦点和意识形态批评的期待视野。

本书第二编侧重于叙事方法批评，尤其是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即关注形式的内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来自美国批评家杰姆逊，但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有众多呼应者，比如卢卡奇、阿尔多诺、马尔库塞、伊格尔顿、巴赫金等，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批评对话的结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新思考。本书第二编分别涉及毕飞宇的叙事策略、苏童的中短篇小说的叙事结构特点、张炜长篇小说的诗意及反讽、先锋派小说的叙事形式，探讨了中国当代作家在小说叙事形式方面的实验和特点，尤其突出了当代文学作品的审美形式的意识形态内涵。换句话说，本书希望能够吸收传统的审美形式研究，比如修辞、细读、话语和文体分析，同时在对审美形式的研究中深入其意识形态层面。

本书第三编侧重于意识形态批评，但并没有将其单一化，而是在对文学文本的结构剖析、文学与电影文本的比较、影视文本的批评、网络文学作品的类型分析中，展开意识形态批评的各个向度的批判，比如民族国家、性别、大众、阶层等。这些批评文章也无一不是从叙事艺术的审美角度出发，来展开对其意识形态内涵的分析的。

文学批评的学理现代化和现实有效性并不因为文化和地域的差异而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还任重道远。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编 \\ 史论角度下的小说批评 1

格非小说论 2

从“欲求”到“匮乏”

——论西方文学欲望叙事的现代转换 27

思与感伤

——韩少功小说论 47

从《黄雀记》看苏童的先锋与救赎 66

第二编 \\ 叙事策略和“形式的意识形态” 87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88

论苏童中短篇小说的转叙 108

论张炜长篇小说的诗意与反讽 127

边缘与叙事 144

第三编 \\ 意识形态批评的向度：

国家、性别和大众 149

论刘震云的空间政治写作 150

女性和民族国家的同一与冲突

——以《我在霞村的时候》和《色·戒》为例 166

性·家庭·权力

——近年来影视作品的女性主义话语分析 180

匪我思存小说的爱的历险与难题 191

影视批评四则 203

参考书目 217

第一編二

史論角度下的小說批評

格非小说论

格非 30 多年来的小说，在空间与时间、先锋与日常、理想与颓废、现代与传统、表现与抒情等方面，表现出一个当代作家对时代和个人关系的自觉反思。格非的小说给人们的启示不仅仅是其展示了一个当代作家的成熟过程，而是作者如何游刃于先锋与传统、欲望与抒情、精神与日常之间，或者说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如何利用传统资源阐释自己所在的时代，表达个体存在的丰富经验和问题。

目之所见，格非的长篇小说有 7 部，中短篇小说合起来共 44 篇。以文本叙事形式的复杂程度为标准，可以把格非的小说以 1997 年作为界限进行划分，同时，这两个时期所关注的问题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前 10 年格非小说的现代派特点浓厚，表达对象偏重抽象的精神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的格非小说平易好读，回归日常生活的琐碎表象，对精神危机的思索也更贴合时代。格非的小说在长达 30 多年的发展中，也保留了一些不变因素，关注知识分子精神困境是其一，欲望是其二。格非小说里的精神困境书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欲望及女性形象的描述和批判，它的严厉程度在中国当代小说里相当突出，确是格非小说研究中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

格非 21 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中国抒情传统与先锋派

审美冒险的某种合体，它是格非对晚清以来的知识生产和审美冒险的忏悔和反思，也是先锋作家吸收中国传统审美方式对包括审美主体与形式在内的审美经验的重构，其问题则在于更深地暴露中国文学晚清以来在现实功利性与审美自足性间的龃龉与冲突。

一、从精神困境到日常救赎

格非在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以及“江南三部曲”里对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描绘，与他的中短篇小说对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瞬间揭示，在根本兴趣上非常一致。所谓沉思型作者、郁郁寡欢的思想者、失败者的代言人等格非一再认可的作者形象，也说明了格非对内在精神生活的关注，以及他从历史角度理解、把握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的愿望。

格非 1997 年后的作品越来越带有一种反讽式的幽默，这首先是对当下社会的陌生感与思考。1997 年的《沉默》是一个并不复杂的作品，写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精神嬗变；1990 年之后的柴峻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看着它终于成为笑谈”^①。这句推心置腹的感慨不仅忽然拉近了格非和当代中国现实的距离，思考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让人意识到，格非小说的隐含作者的男性身份，因为它通常是一位落魄高贵的男主人公的精神独白。《让它去》《打秋千》《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隐身衣》都证明，格非在把握上一个时代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方面，具有坚

^① 格非：《沉默》，《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1 页。

忍的耐力和极高的准确度。

格非前 10 年的中短篇小说里可以轻易地辨认出人和欲望、命运、历史、自我之间的痛苦的阴差阳错，悔恨的主人公比比皆是，不断产生的死亡不过是这些悔恨的一个个注脚，或者说解脱。个体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非常紧张。1997 年后的格非相当宽容，不确定性因素同样出现在 1997 年后的作品里，但这次不是对线性叙事的质疑和挑衅，而是带有黑色幽默的自我嘲讽。比如一个现代主义式的寻找事件，结尾处的谜底竟然是招商引资的政府行为（《失踪》）。在格非后来的小说里，现实越来越成为对主人公的压倒性因素，它的威力最明显地体现在对主人公精神追求的蔑视和摧毁。相对于早期作品里郑重其事的欲望和死亡，格非近 20 年的中短篇小说越来越多地出现“厌倦”“灵魂破产”“悖谬”等话语：“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也许就是对各自的专业感到了厌恶，而对对方的职业却充满了羡慕”^①；亿万富翁李家杰“是在厌倦中死去的，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②；“也许，我们每个人在心底里都想过别人的日子，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本悖谬所在”^③；“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④。

轻松地揶揄和包容一切，同时也厌倦着一切的格非，还是严

① 格非：《苏醒》，《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2 页。

② 格非：《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7 页。

③ 格非：《蒙娜丽莎的微笑》，《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9 页。

④ 格非：《隐身衣》，《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8 页。

肃地在做一个时代的精神描摹，他专注于知识分子的灵魂堕落，这几乎成为他的写作标识。格非异常关注知识分子的内在问题，勇于承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失败命运；这与其说是他对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考察结果，还不如说是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状况的沉痛反思。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地位、价值等方面被社会搁置在一边，不仅无法继续充当全民思想领袖和预言家的角色，而且在商业社会和消费文化中急剧贬值，反思这种商业文化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知识精神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

格非在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里将这一精神反思放置在中国晚清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想及其掀起的社会运动中，予激进运动之后甘于边缘、厌倦一切的知识分子以深切的同情，揭示百年来中国命运与知识分子灵魂挣扎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悖谬结果。敏感的读者将意识到，格非从早期对时间的剪贴拼凑式的迷宫写作，经由对中国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学的学习研究，学会了在历史进程中接受精神追求的含混歧义无疾而终，并最终认识到，一切精神生活的幻象将归于日常生活的安慰。后者终将收留前者。这是格非从传统文化的浸染中得到的向内超越的启示，也是格非与现实的一种妥协。同时，对理想和激进主义的反思也赋予“江南三部曲”一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和审美冒险的忏悔色彩，对于经历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格非这一举动可以说饱含心酸失落。

“江南三部曲”讲述了三代人的审美理想如何直接作用于世界的改造，并一再错过、失败和疯狂的故事。“江南三部曲”类似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是个做减法的过程，写个人如何从名利、欲求、梦想等之中一一解脱剥离出来，剩下的是生命最朴素平淡

的面貌和存在。精神的躁动、孤单落实为一啄一饮的日常琐屑，生命的成熟原来是以褪尽繁华，甚至是以逼近死亡为前提的。端午在俗世中独守一份自然生命，不作恶，给遭遇到的生命以怜悯、关怀，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隐士品格的现代人。家玉名利欲望缠身，直到疾病唤醒自然生命的力量，才抛却一切反思人生，表现出人的尊严。三部曲都是人物最弱的处境偏偏是精神生活最平静自足，甚至幸福的所在。失去爱人、亲人和革命理想的秀米，逃亡路上的佩佩，仕途无望的谭功达都是如此，获得生命的自足与精神的相知。困于欲望，痴于梦想，毁于命运，成于失败，“江南三部曲”把人生的故事说尽，刻画出中国人的向内超越之路，也是对知识生产审美冒险之罪的一次用心忏悔。

格非的中篇小说《隐身衣》以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开篇，却以一个做胆机的生意人针对教授的粗话结尾——“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挺美好的。不是吗？”^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当然是自我嘲讽和反思。格非21世纪创作中所显示的知识生产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对峙，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

新写实主义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最大收获可以说是重新发现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存在。新时期之前，不管是革命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作品，日常生活都被不同程度概念化、模式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张爱玲等偏重日常生活审美的文学家后继乏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经历伤痕、反思、寻根、现代、先锋等流派，却独缺日常生活写作。从日常生活的

^①格非：《隐身衣》，《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页。

经验和体验角度，可以列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如《马桥词典》《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尘埃落定》《平原》《一句顶一万句》《古炉》等；甚至可以这样判定，当代中国作家转向日常生活抒写的时刻也往往是他个人文学创作成熟的时期，比如韩少功、刘震云、余华、阿来、毕飞宇、贾平凹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里所展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与抒情，包括风俗、方言、人情、地域、传统、尊严等，代表着中国当代小说审美维度层面的拓展和对之前当代文学偏重理想与功利的反思。从《马桥词典》《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尘埃落定》《平原》《一句顶一万句》《古炉》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对日常生活有足够认同的审美抒情传奇，从世俗生活与普通人性的角度，来重述一段历史、几代人的人生经历。

“江南三部曲”对理想主义及其社会实践有明确的反思，比如小说里几代人对花家舍的乌托邦构思与实践，往往走向对个体的整体划一管束驯化。在《人面桃花》的结尾，格非更赋予了日常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救赎功能。比如《人面桃花》对秀米出狱后生活的描述，把日常生活本身细微动人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是秀米出狱后对平凡生活之美的一次真正发现——街道、店铺、黑瓦、白云、卖水人、肥汉、孩子……“她还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它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给她带来深稳的安宁。”^①秀米出狱回家后专意照料花草，重栽荷花、养护凤仙花、寻访古梅，她学会了打理自己、种菜、筛米、打年糕、剪鞋样、纳鞋底、为母猪接生等，过上了一种自食其力的质朴生活。

^①格非：《人面桃花》，作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2 页。

小说在讲述日常生活如何接纳下一个各方面都失败的人，而这个人枉费一生的追逐，在这种平凡到极点的日常生活面前，完全是多余的。秀米入狱后的禁语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惩罚，更是对一生践行的理想主义话语甚至语言本身的反思和否定。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从日常生活立场出发的抒写与救赎，形成了与以往宏大历史叙事的立场相疏离的一种文学抒写。

虽然有评论者认为格非对日常生活的抒写，构成了他向传统回归的重要侧面，但需要注意的是，格非对日常的接纳还是以现代性批判为基础的，传统的日常审美与抒情情怀给予了主人公不同于当下世俗的角度和尺度。格非小说的现实生活因此分裂为两个，一个是经过传统浸染的理想现实，另一个是精神分裂的当下现实，或者说现实呈现出紧张的当下和永恒的过往的两种力量。这就很难把格非和现代主义写作区别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非对现实的看法根本上还是带有浓厚的现代派烙印的。

确切来讲，格非以日常伦理和世俗精神来接近当下的同时，也隔离开当下的现实，成了现实生活的旁观者。这种旁观又回应着在中国文学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审美与抒情的传统。

二、抒情与审美经验重构

格非自“江南三部曲”以来的小说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抒情方式，其深层是对审美经验的重构，包括审美主体及形式等。在知识分子视点、理想与日常生活的对立、审美追求的纯粹性等方面，格非依然秉承现代主义的立场；而在日常抒情的审美主体以及审美方式方面，他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从根本上来说